

中國農民戰爭史論叢

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



第五輯

DA7/10

中国农民战争史论丛

第五辑

《中国农民战争史论丛》编辑委员会
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陈宝辉 白 钢

责任校对：马 净

封面设计：式 一

版式设计：韩 锐

中国农民战争史论丛

Zhongguo Nongmin Zhanzhengshi Luncong

第 五 辑

·
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出版
发 行

兵 书 店 经 销

太 阳 宫 印 刷 厂 印 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19.25印张 2插页 427千字

1987年12月第1版 1987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1 400册

ISBN 7·5004·0241·4/K·25 定价：3.30元

确实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。
毛泽东思想，把《中国农民
战争史论丛》编得更好。

王德波
一九六〇年
三月廿

目 录

- 魏晋南北朝时农民战争的社会后果…………… 朱大渭 (1)
- 论隋末唐初的“山东豪杰”…………… 黄惠贤 (61)
- 唐宋之际社会阶级关系的变动与农民战争… 朱瑞熙 (117)
- 关于彭友和陈颢起义的几个问题…………… 向祥海 (166)
- 论元末农民战争中的朱元璋…………… 陈梧桐 (187)
- 华林农民起义史实辨析…………… 何友良 (209)
- 孙可望评传…………… 顾 诚 (229)
- 沙定洲之乱与大西军入滇…………… 海 涓 (271)
- 后期大西军营庄制度初探…………… 秦 晖 (311)
- 论卢茂起义及其相关诸问题…………… 赫治清 (358)
- 清代道光年间瑶民起义述论…………… 张捷夫 (410)
- 金田起义杂识…………… 庄建平 (428)
- 洪仁玕的军事思想…………… 余明侠 (452)
- 论封建专制主义与农民战争的关系…………… 白 钢 (481)
- 〔读史札记〕
- “徐寿辉启发、动员邹普胜参加起义”说
 质疑…………… 韩志远 (561)
- 〔书 评〕
- 评孙达人著《中国古代农民战争史》
 (第一卷)…………… 王家范 (564)
- 〔国外研究动态〕
- 明末传教士关于张献忠起义军的记载…………… 志 勇 (575)
- “叛乱”与“叛乱”之间的关系——清代的
 教派家族体系…………… 〔美〕韩书瑞 (588)
- 参考书目…………… (607)

魏晋南北朝时农民战争的社会后果

朱大渭

关于农民战争的社会后果问题，是农民战争史研究中的一个有待于进一步探讨的课题。当前学术界关于这一问题的意见很不一致，有一种意见对农民战争所推动的封建社会关系的变化视而不见，却断言农民战争“阻碍了历史的进步”，这是笔者所不敢苟同的。本文拟以魏晋南北朝农民战争的社会后果为研究对象，具体考察一下这一时期的农民战争究竟是“阻碍了历史的进步”，还是推动了社会的发展？！

（一）农民战争促使士族制度的衰落

魏晋南北朝是高门士族居于最高统治地位的时期。士族制度的形成和衰落，固然有它本身的发展规律，而农民战争在其走向衰落的过程中，却起了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。士族制度是在两汉官僚地主势力不断膨胀的基础上形成的，这种制度使高门士族成为封建统治阶级中世袭的比較稳定的最上层，独享各种封建的经济、政治和文化特权。这就决定了士族制度一旦形成后，高门士族集团便带有极大的寄生性和腐朽性。西晋门阀政治的极端腐败，最集中地体现了这一点。如晋武帝的奢淫，晋惠帝的无能，贾后的专擅，其结果西晋政权统一

不过十一年，便爆发了长达十六年之久的宗室亲王争夺皇位的“八王之乱”。我国封建社会的统一政权，象西晋统一时间之短，瓦解之迅速，以及最高统治集团斗争之剧烈都是少有的。有人指出：“历观前代，国家之祸，至亲之乱，未有今日之甚也。”^①当然这是各方面的因素形成的，但皇室司马氏是最大的士族，它本身的腐朽无疑是重要原因之一。士族制度的形成有其经济、政治、军事、文化等各方面的基础，因而这种制度要退出历史舞台绝不是容易的事。通过这个时期数百次农民战争的反复冲击，逐渐削弱高门士族的势力，加上士族集团的内部斗争，以及庶族地主和少数民族酋帅的不断反抗，最后终于促使高门士族势力走向衰落，将士族制度推下了历史舞台。

高门士族遭受农民战争的打击而趋向衰落，大体上可分为三个时期。第一个时期是在西晋末年各族人民大起义打击下，高门士族统治的西晋王朝被摧毁，在这场激烈的阶级斗争中，大批高门包括司马氏皇室在内，被起义军或少数民族酋帅所消灭，除一部分士族南逃之外，留在北方的高门士族，无论在经济和政治上都遭受一次沉重的打击。其中最为突出的有四次。第一次在永嘉五年（三一一年）四月，石勒追东海王司马越丧于陈郡苦县（今河南鹿邑县东），“太尉王衍、吏部尚书刘望、廷尉诸葛铨、尚书郑豫、武陵王澹等皆遇害”^②。司马越出京时“王公卿士随从者甚众”，石勒“以围骑而射之，相践如山。王公士庶死者十余万”^③。第二次在同月稍后，石勒执东海王越世子司马毗和宗室三十六王，以及“诸

① 《晋书》卷五九《齐王罔传》。

② 《晋书》卷五《孝怀帝纪》。

③ 《晋书》卷五九《东海王越传》。

王公卿士，皆害之，死者甚众”^①。第三次在同年六月，刘曜、王弥攻入京都洛阳，焚烧宫室，吴王晏，竟陵王楙，尚书右仆射曹馥，尚书闾丘冲、袁粲、王缙，河南尹刘默等被戮，并“害诸王公及百官已下三万余人”^②。第四次在建兴二年（三一四年）三月，石勒攻陷幽州（治今北京市），责浚“百姓馁乏，积粟五十万斛而不振给”^③，杀侍中、大司马、幽州牧、博陵公王浚，“焚烧城邑，害万余人”^④。

石勒、王弥农民起义军在镇压高门士族时，不免会滥杀无辜，但其主要锋芒还是针对门阀统治的，如石勒焚司马越枢时愤恨地说：“此人乱天下，吾为天下报之，故烧其骨以告天地。”^⑤王弥弟王璋“焚其余众，并食之”^⑥。当第一流大士族琅邪王衍被俘后，“衍自说少不豫事，欲求自免。因劝勒称尊号”^⑦。石勒义正严词地怒斥说：“君名盖四海，身居重任，少壮登朝，至于白首，何得言不豫世事邪？破坏天下，正是君罪。”……使人夜排墙填杀之。”^⑧

同时，起义军在攻城略地中所杀戮的士族官僚，不计其数。如尚书左仆射东莱刘暉^⑨，平南将军、都督江北诸军事泰山羊伊^⑩，参东海王越太傅军事颍川庾敳^⑪，陈留太守王衍子王玄^⑫，徐州刺史斐盾，兖州刺史田徽，征西大将军贾疋，大将军苟晞，车骑将军王堪，龙骧将军李恽，安北将军

① 《晋书》卷一〇四《石勒载记》上，卷五九《东海王越传》。

② 《晋书》卷一〇二《刘曜载记》，卷五《孝怀帝纪》。

③ 《晋书》卷三九《王沈附子浚传》。

④ 《晋书》卷五《孝感帝纪》。

⑤⑥ 《晋书》卷五九《东海王越传》。

⑦⑧ 《晋书》卷四三《王衍传》。

⑨ 《晋书》卷四五《刘曜附子暉传》。

⑩ 《晋书》卷三四《羊祜传》。

⑪ 《晋书》卷五〇《庾峻附子传》。

⑫ 《晋书》卷四三《王衍附子玄传》。

王斌，临川内史谢朓，襄城太守崔暕，濮阳太守韩弘^①等人，皆被义军所镇压。

南方杜弢起义“杀二千石、长史甚众”^②。史称：“李辰（张昌）石冰倾之于荆扬，（刘）元海，王弥挠之于青冀，戎羯（石勒）称制”，“扰天下如驱群羊，举二都如拾遗芥，将相王侯连颈以受戮，后嫔妃主虏辱于戎卒，岂不哀哉”^③。封建史家哀叹：“祸难之极，振古未有”^④，“衣冠礼乐，扫地俱尽”^⑤。

经过西晋末年各族人民大起义的冲击，使北方的高门士族势力一度削弱，因而十六国政权尽管存在着差异，但除前凉和前燕政权特殊外，其他各政权虽在不同程度上利用过士族！甚至有的还企图恢复士族制度，但各政权最高统治集团的决策人物，主要皆出身少数民族酋帅和汉族庶地主阶层。我们以统治北方区域最广的后赵和前秦两个政权为例，可以窥见一斑。后赵最高统治者石勒，饱尝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的痛苦，所以对士族有刻骨的仇恨。他多次以极端严厉的手段镇压士族，是代表一种阶级的报复行为，并非一时的感情冲动，更非天性残忍^⑥。石勒称赵王后，对士族的态度虽有所改变，但他前后所重用的最高决策人物中，除各少数民族酋帅外，汉人中起初最重要的是张宾。当他称赵天王（咸和五年，三三〇年）后，署徐光为中书令，领秘书监，郭敖为尚

① 以上均见《晋书》卷五《孝怀帝纪》、《孝愍帝纪》。

② 《资治通鉴》卷八七《晋怀帝纪》，永嘉五年。

③ 《晋书》卷五《孝愍帝纪》后引于宝言。

④ 《晋书》卷五九《史臣曰》。

⑤ 《晋书》卷九一《儒林传·序》。

⑥ 参考熊德基：《魏晋南北朝时期阶级结构研究中的几个问题》，见《魏晋隋唐史论集》第一辑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。

书左仆射，程遐为右仆射，领吏部尚书，其余夔安为左司马，郭殷为右司马，李凤为从事中郎，任播为侍中，斐宪为尚书^①。以上九人中只有斐宪、任播二人是出身士族，其余七人都出身寒门庶族^②，而且这七人居于石勒最高统治集团的决策地位。石勒以张宾为谋主，“机不虚发，算无遗策，成勒之基业，皆宾之勋也”^③。张宾是赵郡中丘（今河北内丘县西）人，父瑤虽曾作过太守，其祖父、曾祖父皆不知名，而赵郡高门不见有张氏。他投靠石勒时曾说：“吾历观诸将多矣，独胡将军（石勒）可与共成大事”^④。当时北方士族为石氏所用“恒以为辱”^⑤。张宾与士族传统的鄙视胡人的民族偏见相比，形成鲜明的对比。而且他“提剑军门，大呼请见”^⑥。同高门重视礼法的门风，大相径庭。张宾当出身寒门，即庶族地主阶层知识分子。石勒后期重用的汉人中，当首推程遐与徐光。程遐为勒世子弘之舅，石勒在称赵王前，对士族深恶痛绝，如遐家也为士族，不可能与勒联婚。故在敦煌佚名残卷本《晋纪》中，程遐被列为庶族应是可信的。徐光先世不知名，其父聪以牛医为业。他被石勒将王阳所俘时，“令主秣马”^⑦，可见其出身寒门庶族无疑。另外。石勒以士族斐宪、傅畅、杜嘏领经学祭酒，续咸、庾景为律学祭酒，任播、崔潜为史学

① 《晋书》卷一〇五《石勒载记》下。

② 敦煌残卷本佚名《晋纪》列举石勒所重用的胡人后说，“晋人有程遐、徐光、朱表、韩揽、郭敬、石生、刘征；旧族见用者，河东斐宪、颍川荀綽、北地傅畅、京兆杜宪、任安任播、清河崔渊。”《晋纪》把庶族和士族两类人分得很清楚，其中人名与《晋书》《石勒载记》有差异。荀綽为勒参军，见《晋书》卷三九《荀勖传》。

③④ 《晋书》卷一〇五《张宾传》。

⑤ 《晋书》卷四四《卢钦附从孙谡传》。

⑥ 《晋书》卷一〇五《张宾传》。

⑦ 《太平御览》卷三八四，《人事部》二五。

祭酒^①。显然在于利用士族高门所掌握的文化和封建统治的经验，使其为后赵政权服务，但他们大多不参与最高层的军政决策。

前秦苻坚即皇帝位，所重用的最高决策人物，除苻氏宗室外，汉人王猛为中书侍郎，李威为卫将军、尚书左仆射，强汪为领军将军，仇腾为尚书领选，席宝为丞相史长、行太子詹事，吕婆楼为司隶校尉，梁平老为右仆射，薛讚为中书侍郎，权翼为给事黄门侍郎，其余秘书监朱彤，中书令梁熙，尚书邓羌，黄门侍郎程宪，御史中丞李柔，重要将领杨安、张蚝、彭越、毛当^②等十六人中，除吕婆楼和梁平老为氏族^③外，其余大都是汉族庶族地主人物。王猛是北海剧县（今山东寿光县东南）人，家于魏郡（治今河南临漳县西南）。他先世无名，“少贫贱，以鬻蚕（土筐）为业”，“博学好兵书”^④，应为庶族士人。王猛后居丞相、中书监、尚书令，前秦“军国内外万机之务，事无巨细，莫不归之”^⑤。另外苻坚以高平（治今山东金乡县西北）苏通，长乐（治今河北冀县）刘祥“硕学耆儒，尤精二礼”。任通为礼学祭酒，居于东庠；祥为仪礼祭酒，处于西序。坚“每月朔旦，率百僚亲临讲论”^⑥，意在提倡儒学，吸收汉族封建统治经验。前秦统治北方四十四年，极盛时期“平燕定蜀，擒代吞凉，跨三分之二，居九州之七，遐荒慕义，幽险宅心，……虽五胡之盛，莫之比也”^⑦。这个

① 《晋书》卷一〇五《石勒载记》下。《晋书》卷四四《卢钦附从孙谧传》称：“（谧）与清河崔悦、颍川荀綽、河东裴宪、北地傅畅并沦陷非所，虽俱显于石氏，恒以为辱”。

② 《晋书》卷一一三《苻坚载记》上。

③ 参考姚薇元：《北朝胡姓考》第三四六页，《吕氏条》，第六二页，《梁氏条》，“老”误为“志”。见中华书局一九六二年版。

④⑤ 《晋书》卷一一四《苻坚载记》下附《王猛传》。

⑥ 《太平御览》卷二二六，《职官部》三四。

⑦ 《晋书》卷一一五《苻丕苻登载记》《史臣曰》。

统治黄河流域地域最广，并具有典型性的政权，同后赵政权相似，参与最高决策层的军政要人中，以少数民族酋帅和汉族庶族士人为主，比起西晋门阀政治来发生了显著变化。这种情况虽然同当时民族矛盾严重有关，但庶族士人同样是汉人，何以得到重用呢？应该说，高门士族在少数民族政权中地位的下降，乃是其势力削弱后在政治上的必然反映。

东晋末年孙恩徐道覆起义，给予高门士族第二次严重打击。西晋政权被推翻后，北方士族大量南逃，东晋王朝是在南北士族相结合的基础上建立的，因而形成门阀政治的极盛时期。东晋孙恩徐道覆起义向东晋政权发起猛烈冲击，一方面，给予以王谢为首的中央士族当权派以沉重打击，使士族所掌握的北府兵权转入庶族出身的刘裕手中^①；另一方面，促使士族内部矛盾加深而暴发了内战，荆州（治今湖北江陵县）刺史桓玄起兵攻入建康，建立了楚政权（元兴二年，四〇三年）。翌年春天，以刘裕、刘毅、何无忌、诸葛长民、孟昶等二十余人为代表的庶族地主势力，从北府兵的根据地京口和广陵两处起兵，反抗楚政权，结果桓玄失败。刘裕等人尽诛桓氏宗族及其余党，并奉安帝复位。至义熙四年（四〇八年），刘裕为扬州（治今江苏南京市）刺史录尚书事，同他一道起兵的重要人物，也先后列入高级官僚之行列。如孟昶为尚书左仆射，刘毅为豫州（治今安徽寿县）刺史，何无忌为江州（治今江西九江市）刺史，诸葛长民为青州（治今江苏丹徒县东南）刺史，刘道规为荆州刺史，刘道怜为并州（寄治今江苏淮阳县东南）刺史，刘藩为兖州（寄治今江苏江都县东北）刺史，刘敬宣为冠军将军，刘怀默为广武将军，孟怀玉为辅国将军。他

^① 参考唐长孺：《士族的形成和升降》，见《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》，中华书局一九八三年版。

们虽然不能完全排挤士族，要利用士族，而且以后同士族既斗争又合流，但毕竟打破了士族独掌政权的局面。

刘裕集团同桓玄集团之间的斗争，实质上是庶族地主同士族地主之间的斗争。刘裕集团多为北府兵下级军官，住在京口好武之地，“俱起布衣，共立大义”^①。北魏崔浩曾说：

“刘裕挺出寒微，不阶尺土之资，不因一卒之用，奋臂大呼而夷灭桓玄。”^②这正是士族衰落和庶族兴起的必然趋势所决定的。刘裕镇压徐道覆卢循起义后，于东晋元熙二年（四二〇年）代晋，建立起宋朝。庶族地主刘裕起兵的胜利和他爬上皇帝的宝座，使士族在政治上的垄断权被冲破一道缺口。虽然历整个南朝，士族在政治经济上还有较大的势力，特别是社会地位一直很高，然而寒门庶族地主也不断地拥进最高统治层，并逐渐控制着实权。

庶族同士族的斗争早在西晋时就开始了^③，但庶族地主同高门士族有紧密的联系，多为其掾属或门生故吏，二者同样压迫剥削人民，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，常常联合起来镇压各族人民的反抗。像陈敏、陶侃、刘牢之、刘裕等寒门庶族地主人物，都是靠镇压人民起义起家的，所以庶族对士族的斗争带有很大的局限性。这种斗争要取得胜利，必须依靠人民群众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削弱士族势力后才有可能实现。刘

① 《宋书》卷四二《刘穆之传》。

② 《魏书》卷三五《崔浩传》。

③ 西晋用人“唯才”或“唯资”的争论，实际上反映了士庶斗争。主张用人唯才，以寒门庶族王沉的《释时论》，刘廙的《崇让论》，孙登向阮籍的谈话，陈頔向王导的上书为代表。他们反对“计门资之高卑，论势位之轻重……公门有公、卿门有卿”（《晋书》卷九二《王沈传》）的现象。陈頔并认为“中华所以倾弊，四海所以土崩者，正以取才失所”。东晋时陈敏“欲诛诸士人”，陶侃、刘牢之“欲诛机政”的斗争，也属士庶斗争（《晋书》卷一〇〇《陈敏传》，卷六六《陶侃传》；《宋书》卷四七《刘敬宣传》）。

裕集团正是在农民战争打击和削弱士族势力后登上政治舞台的。从刘裕当政起，首先士族的兵权被解除了，以后有名的将帅大都出身寒门庶族。至于寒人掌机要即控制实际政权，也是从刘宋时开始的。赵翼指出：“江左诸帝，乃出自素族……其他立功立事为国宣力者，亦皆出于寒人。”^①赵翼把“素族”和庶族混同是错误的，^②但他认为从刘宋开始寒门庶族兴起，还是符合历史实际的。这里从刘裕当政后至宋末为例，中央尚书令（附录尚书事），仆射（附左、右仆射）、中书监（附令）、侍中、吏部尚书、领军和护军将军（资轻者为中领军和中护军，现并为一职），以及方镇州刺史等五品以上的文武要职官员中，高门士族和寒门庶族出身的人物所占的比例来看，中央文武要职官员共二百六十人，士族地主一百六十三人，约占百分之六十三；庶族九十七人、约占百分之三十七。方镇州刺史共二百零八人，士族地主六十二人，约占百分之三十；庶族一百四十六人，约占百分之七十^③。这个统计清楚地表明，虽然中央文武要职官员中高门士族人物仍占大多数，但寒门庶族也占了一定的比例，而州刺史寒门庶族人数则占多数。两晋以来所谓：“上品无寒门，下品无势族”^④的门阀统治局面被打破了。东晋高级官僚（官职

① 赵翼：《廿二史劄记》卷八、卷一二。

② 参考唐长孺：《误史释词》《素族》条，见《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》，中华书局一九八三年版。

③ 以上统计数字主要依据万斯同《宋将相大臣年表》和《方镇年表》制成，文武要职中有难以确定出身的三十八人除外。又，一人先后任尚书令和录尚书事者以一人计，一人先后任中书监和中书令者以一人计，一人先后任中领军和中护军者以一人计，一人先后任几州刺史者以一人计，一人先后任同一职者以一人计，被委任后未到任者不计。

④ 《晋书》卷四五《刘毅传》。《宋书》卷九四《恩幸传》为“下品无高门，上品无贱族”。

同上)共三百五十五人,其中出身寒门庶族的简直是绝无仅有,而且包括的六十六种姓氏中,高门王氏六十九人,桓氏二十六人,司马氏二十人,谢氏二十人,庾氏十五人,周氏十三人,陆氏十二人,顾氏八人,共计一百八十三人。皇室和七家大士族只占总姓氏的百分之十二左右,人数却占总人数的百分之五十二左右。这八家大士族中,司马氏、桓氏、庾氏、周氏、陆氏、顾氏等六家大士族,在刘宋时或者不占重要地位,或者完全衰落了。刘宋政权中高级官僚共五百零六人,包括七十四种姓氏,比起东晋高级官僚所包括的姓氏来,旧姓氏减少三十种,新姓氏增加三十八种。减少的姓氏中大多数是魏晋以来显赫的高门士族,例如像皇室司马氏、谯国桓氏、颍川荀氏,高平郗氏、范阳祖氏、太原温氏、弘农杨氏、会稽虞氏、颍川锺氏、会稽丁氏、济阳卞氏、丹杨甘氏、纪氏、渤海刁氏、广陵戴氏、魏郡邵氏、颍川韩氏、南平车氏,等等。刘宋增加的姓氏中,如庞氏、坦氏、费氏、常氏、吕氏、任氏、姚氏、胡氏、黄氏、申氏、明氏、鲁氏、宋氏、符氏、薛氏、管氏、吉氏、甄氏、梁氏、萧氏、臧氏、程氏、丘氏、路氏、到氏、伯氏等等^①,大多数是新起的或原来不占重要地位的姓氏,魏晋以来很少出过军政显贵人物。从刘宋开始,由于一部分寒门庶族在政治上居于最高地位,以及士庶官职在实际上混同,所以宋齐时期“士庶杂选”^②,士庶户籍错乱,士庶婚姻相通,士庶区别混淆等所谓“士庶不分”

① 参考拙作《孙恩徐道覆起义的性质及其历史作用》,《历史论丛》第一辑,中华书局一九六四年版。

② 《南齐书》卷五六《幸臣传》,此虽专指皇帝近臣中书舍人,但也可窥见一斑。

现象的产生，就是不可避免的了^①。宋齐时代的检籍斗争，从一个方面说，也是反映了一场士庶斗争，士族企图把持独享政治经济等封建特权，而寒门庶族地主则采取贿赂办法，“改注籍状”，即在户籍上伪造先人官爵，冒充士族。宋齐三十六年的检籍斗争终于失败，说明庶族兴起并挤入士族行列，已是既成事实，不可逆转^②。所有这些表明，东晋时少数几家士族把持政权的局面改变了，刘宋政权的基础扩大了，最高统治权正在开始由士族转向寒门庶族手中。也就是说，两晋以来的权门政治开始走向没落，寒门庶族逐渐兴起并参与政权。尽管士族地主千方百计地想扭转这种趋势，但整个南朝的历史证明，他们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了。当然，在促进东晋南朝士族走向衰落的全过程中，如皇室与权臣的内讧，以及江陵（今湖北江陵县）之变，侯景乱梁，隋灭陈等事件都曾起过作用。但是，孙恩徐道覆起义促使东晋门阀政治开始衰落，刘宋时大批寒门庶族地主登上政治舞台、对南朝高门士族没落和寒门庶族兴起具有开其端的首要意义，这是必须肯定的。

北魏末年各族人民大起义，给予高门士族第三次严重打击。北方高门士族势力曾一度遭受打击后，十六国后期又逐渐复苏，在北魏统一北方和稳定政局的过程中，高门士族起了重要作用。如北魏明元帝拓跋嗣（四〇九—四二四年）、太武帝拓跋焘（四二四—四二五年）用士族崔浩，“言听计从，宁廓区夏”^③。魏孝文帝使高门李冲“总整朝务”，

① 《宋书》卷八二《沈怀文传》，《建康实录》卷一三，《南齐书》卷三四《虞玩之传》，《通典》卷三。

② 参考唐长孺：《士人荫族特权和士族队伍的扩大》，见《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》，中华书局一九八三年版。朱大谓：《唐高之起兵的性质是农民起义吗》，《中国农民战争史论丛》第一辑，山西人民出版社一九七九年版。

③ 《魏书》卷三五《崔浩传》《史臣曰》。

“委以台司之寄”^①。一批汉族士族高门佐孝文帝实行均田、三长、迁都和汉化等改革措施。孝文帝迁都洛阳后，正是在高门士族势力抬头的的基础上，采用了汉族的士族制度，制定姓族，并“于诸州普设中正”。除帝室元氏及长孙、叔孙、奚氏四姓外，鲜卑以穆、陆、贺、刘、楼、于、嵇、尉八姓为首^②；汉人士族山东（指太行山以东）以清河崔氏、范阳卢氏、滎阳郑氏、太原王氏、赵郡李氏为首，关中以韦、斐、柳、薛、杨、杜、皇甫为首^③，同时还把士族分为四海大姓、州姓、郡姓、县姓四级^④。本来北魏初期不重门第，“唯能是寄，不必拘门”，“清浊同流，混齐一等，君子小人，名品无别”^⑤。当孝文帝定姓族后，各级士族按等级享受入仕、免役、荫庇人户等特权，这样“以贵承贵，以贱袭贱”^⑥的士族制度，便在北魏中期重建起来。士族制度的重建，显然是北方士族和北魏宗室贵族政治经济势力恶性膨胀的产物。此后士族在政治上的垄断权，反过来又为其经济实力的增长提供了有利条件，因而北魏末年士族制度发展到极盛时期，正像东晋一样，北方门阀势力的迅猛发展，其腐朽性也更加暴露。

北魏末年，各族人民大起义，对最高士族集团的打击，其势如摧枯拉朽。史称：“王师虽众，频被摧北，人情危怯，实谓难用”^⑦。又说：“诸将出征，相继奔败，所亡器械资

① 《魏书》卷五三《李冲传》。

② 《魏书》卷一一三《官氏志》。

③ 《新唐书》卷一九九《柳冲传》附柳芳语。太原王氏本山西，附此。

④ 参考唐长孺：《论北魏孝文帝定姓族》，见《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》，中华书局一九八三年版。

⑤ 《魏书》卷五九《刘昶传》。

⑥ 《魏书》卷六〇《韩麒麟传附子显宗传》。

⑦ 《魏书》卷七四《尔朱荣传》。